

主編·韓格平

魏晉全書

吉林文史出版社

1

主編 韓格平
副主編 董蓮池 曹書傑 李德山

本卷主編 李德山



魏晉全書

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晉全書. 1/韓格平主編.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
ISBN 7-80702-356-2

I. 魏... II. 韓... III. 古籍—匯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
IV. Z423.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35170 號

魏晉全書 ①

主 編/韓格平

副 主 編/董蓮池 曹書傑 李德山

本卷主編/李德山

責任編輯/吳 燕

裝幀設計/李岩冰

出版發行/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長春市人民大街 4646 號

郵政編碼/130021

網 址/www.jlws.com.cn

印 刷/長春第二新華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規 格/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張/37

字 數/67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7-80702-356-2

定價:98.00 元

前言

中國的魏晉時期，又稱作三國兩晉時期，指魏文帝曹丕稱帝的黃初元年（公元二二〇年），至晉恭帝司馬德文禪位的元熙二年（公元四二〇年），共計二百年。這個時期，與此前延續四百年的兩漢時期相比較，具有兩點明顯不同：第一，政權幾經更疊，戰事連綿不斷，原有的綱常制度受到巨大衝擊，社會生活長期動蕩不安。如果用較簡明的語言形容的話，這個時期給人的感覺是各個方面都很『亂』。第二，文人學士從事寫作的自覺性、主動性更加明顯。如果說，兩漢時期文人寫作需要考慮到作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說的某些限制的話，那麼，這個時期的文人仿佛恢復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直陳己見的傳統，只不過顯得更具理性，更有個性。面對紛紜複雜的社會問題，廣大文人秉筆暢言，或闡發傳統經典，或總結古今得失，或直陳治國方略，或吟詠個人情懷，形成了繼戰國之後的又一次文人創作高潮。

關於魏晉時期全社會的圖書總體情況，陳壽《三國志》和房玄齡等人所撰《晉書》沒有記載，清代及民國時期學者根據史料，補編了幾部魏晉時期的群書目錄，具體情況如下：

作者及書名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佛教道教	合計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一四五	一一〇	九一	〇		三四六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一七六	一八四	一七三	九一	四九六	一二二〇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	三二三	六〇一	二三〇	四七七	一二七	一七五八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	三四〇	七七二	六六九（含佛教道教）	四九八		二二七八

作者及書名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佛教道教	合計
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	三七八	八五五	七七九(含佛教道教)	六二二	二六三四	
吳士鑒《補晉書經籍志》	二五九	八五〇	三九八(含佛教道教)	四六七	一九七四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	二五〇	三二一	二六三	四五四	一二八八	

我們選取著錄圖書較多的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一千一百二十部)和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二千六百三十四部)，二者共著錄魏晉時期著作三千七百五十四部。《漢書·藝文志》共著錄西漢末年圖書五百九十六家，姚、秦二《志》著錄的圖書是其六倍。歷代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著錄的是當時社會現存的圖書，其中包括前代學者的著作。如《漢書·藝文志》包括大量先秦時期的著作。然而，上述這些魏晉群書目錄，則均以收錄當時學者著作為限。當然，這些目錄之中亦包括少數作者生活時代在此之外的特例，以及各部目錄著錄重複的著作，當然，還有數字統計上的差誤，即便如此，魏晉文人的著作數量也是相當驚人的。

魏晉時期的文人著作不僅數量較多，而且具有較高的學術性。我們以中國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為例。目前較為通行的儒家經典總集是《十三經註疏》，其中有五部經典的注釋部分為魏晉學者所作，它們分別是：

《周易註疏》(魏)王弼(晉)韓康伯注

《春秋左傳註疏》(晉)杜預集解

《春秋穀梁註疏》(晉)范甯集解

《論語註疏》(魏)何晏集解

《爾雅註疏》(晉)郭璞注

可以說，上述五種注釋，對於閱讀和研究相關的儒學經典，至今仍然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下面，我們從中國傳統圖書分類的經、史、子、集四個方面，大致勾勒一下魏晉圖書的基本風貌。

第一，經部著作。

經部著作，主要指儒家幾部重要經典和歷代對於這些儒家經典的注釋與解析的著作，以及為了閱讀和理解儒家經典所必須使用的傳統小學類著作（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語言學類著作）。魏晉時期，人心思治，學者們積極探討治國方略，他們的主要理論根據是前代的經典著作。而秦漢以來的經典著作中，儒家經典因其更為關注國家大政而受到魏晉學者的高度重視。為了便於人們更好地閱讀理解儒家經典，魏晉學者們撰寫了大量的經部著作。不過，人們對於儒家幾部主要經典傾注的精力不盡一致，所以，產生的注釋、解析類著作的數量也不平衡。具體情況如下：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孝經	論語	五經	小學	識緯
姚志	五二	七	一四	一八	一六	二四	一三	九	一四	二〇	一六
秦志	三八	一八	三三	八四	九	七八	二二	四九	十	三八	〇
合計	六三	二五	四七	一〇二	二五	一〇二	三四	五八	二四	五八	一六

從數量上看，居於前二位的是《禮》與《春秋》類經學著作。《禮》包括《儀禮》、《禮記》、《周禮》，《春秋》包括《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二類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加上人們對於前代禮制知識與歷史知識的普遍關注，所以，這兩類著作比較多。排在第三至第五位的是《易經》、《論語》和小學類著作。《周易》本身是預知吉凶的占卜書，在解釋禍福吉凶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天道觀與辯證法。動亂中的人們更為關心禍福吉凶，更希望《周易》能夠為解釋現實問題服務，所以，魏晉時期的《易》注較多。同時，這些《易》注較少漢代京房《易》注的「數」的繁瑣虛渺，而是更設法貼近生活。例如王弼在解釋《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卦象之後，有一段抒發個人看法的話：「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睹，不亦宜乎？」利用《周易》中出現「大人」一詞的機會，用儒家「德」的範疇來規範「大人」之所為，反映出王弼《周易注》關注現實生活的基本特徵。同時，王弼《周易注》偶爾借用《老子》道家的某些範疇注釋《周易》。如《復卦·彖》：「《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注：「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

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復卦》立足於陰陽四時的往復變化來解釋卦象，《象》語認為往復變化反映了天地的本質特徵，王弼則進一步指出，「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無，是其本矣」，用「寂然至無」來解釋天地自然的運行變化。這裏的「無」借用於《老子》，但由此闡發的「以無為本」的學說，卻是王弼時期玄學的核心命題之一。

《論語》主要闡述的是如何做一名正人君子（內在條件），以及君子應當如何立身行事（外在表現），換句話說，《論語》談的是文人學士們的人生觀、世界觀與方法論。這些問題，也正是亂世文人不斷探索的問題。因此，闡釋《論語》的著作也比較多。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何晏《論語集解》。其序曰：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查今本何晏《論語集解》共有一千〇九十四條注釋，其中孔安國四百七十三條，包咸一百九十三條，何晏一百四十七條，馬融一百三十二條，鄭玄一百條，王肅三十二條，周生烈十四條，陳群三條。孔安國與馬融的注釋占全部注釋的半數以上，知何晏《集解》更多地採用了《古文論語》的學術成果。加上包咸與鄭玄的注釋，全書注釋的絕大部分選錄於漢代學者。而「近故」之陳群、王肅、周生烈的注釋共計四十九條，不足全書注釋的二十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何晏針對前人注解中「有不安者」所作的一百四十七條注釋。這些注釋或釋語詞，或講史事，或揭示原著語意，行文曉暢簡捷。同時，何晏的注釋中經常化用《周易》中的語言，如《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元亨、日新為《周易》常語。《衛靈公篇》：「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天

下殊途」為《周易·系辭下》載孔子語，何晏用為注語，十分貼切。這種巧妙借用《周易》的情況，與正始年間的學術風尚有關。

在上述五十八種小學類著作中，《爾雅》注釋類著作九部，《方言》注釋類著作二部，《釋名》辨正類著作一部，姚、秦二志著錄重複二部，其他四十四部為新撰的字書、韻書或訓詁書。東漢末年以來，《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四部傳統小學的重要著作已經在文人中廣為流傳。其中，《爾雅》的閱讀難度最大，所以，魏晉文人對其注釋的著作也較多，郭璞《爾雅注》具有代表性。《說文解字》、《釋名》則因問世不久，尚無人為其作注。在新撰著作中，以李登《聲類》、呂靜《韻集》為代表的韻書開創了漢語音韻研究的先河，是這一時期語言研究的重要成就。

第二，史部著作。

史部著作，具有記錄當代史實、總結歷史經驗兩個主要功能。魏晉史部著作，除了直接討論歷史問題的正史、雜史、史評等類著作外，還包括職官、地理、目錄、家譜等類著作。在《漢書·藝文志》中，史部著作數量較少，附屬於《六藝略》的《春秋類》著作之後，僅有《議奏》、《國語》、《太史公》等十二部史書。魏晉時期，史部著作數量大增。據姚、秦二《志》著錄，共達一千〇三十九部，是經史子集四類中增長最多的一類。具體情況如下：

	正史	編年	別史	雜史	史鈔	史評	故事	職官	儀制	刑法
姚志	二三	三		九	六	三	一一	一五	一五	八
秦志	一七	三八	三八	六四	十	三		一八		

	雜傳記	地理	譜系	簿錄	奏議	載記	時令	政書	目錄
姚志	五四	二八	四	五					

秦志	雜傳記	地理	譜系	簿錄	奏議	載記	時令	政書	目錄
三四三	九二				二七	九三	二一	八八	二二

史部著作增長較快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魏晉時期，國家大部分時間處於分裂狀態，各個政權均置史官，史官數量的增多有助於史學創作的繁榮。其二，文人學士以史為鑒的史學意識更為普遍，更為自覺。長期社會動亂，促使人們反思歷史。例如，這一時期，不僅《春秋》類注釋較多，人們也很重視《漢書》。孫權曾經專門派人指導太子學習《漢書》；姚《志》史部正史類共著錄二十四部書，其中有《漢書》注釋的有十六部（《史記》注釋無）；秦《志》史部正史類共著錄十七部書，其中有《漢書》注釋的有十一部（《史記》注釋二部），反映出人們對於西漢時期國家統一、政權強盛的向往與渴望。另外，晉武帝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墓，得古書七十五篇，其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所言夏商至戰國魏安釐王事，多與《左傳》、《史記》等史書相合，更增強了人們對史學研究的興趣。

縱觀魏晉時期的史部著作，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有代表性的史學名著不多。中國自古就有盛世修史的傳統。兩漢時期，中央政權實行著較為有效的統治，司馬遷編纂《史記》，班固編纂《漢書》，均是稟受朝廷之命的職務行為。國力的強盛與朝政的穩定，為司馬遷和班固的寫作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和必要的政治環境。魏晉時期也曾有過幾次官修史書的事情，但結果都不太理想。例如，孫權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竣始撰《吳書》。孫亮即位，任命韋昭為太史令，主撰《吳書》，華覈、周昭、薛瑩、梁廣四人參與其事。孫皓即位，欲為己父孫和作《紀》，韋昭認為孫和未登帝位，只能作《傳》，於是結怨，被孫皓殺害。此時，《吳書》已經撰有五十五卷，但其中的敘贊部分還沒來得及寫，實在可惜。當權者的好惡對史書的影響，在王沈《魏書》的編纂上表現也很明顯。王沈受命與韋誕、應璩、阮籍、孫該、傅玄等共撰《魏書》，然而，王沈是在魏高貴鄉公曹髦正元年間（正元只有兩年，西元二五四—二五五年），以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衛主持《魏書》編纂的。當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王沈沒有韋昭的膽量，不敢堅持歷史真實，所以，其獨撰之《魏書》四十四卷，「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假回斜以竊位」，「濫述貶甄之詔」（以上對於《魏書》之評價分見於《史通》之《正史篇》、《直書篇》、《曲筆篇》）。官修史書多有不便，於是，許多文人以個人之力修史。魚豢私撰《魏略》三十八卷，裴松之《三國志注》等許多著作

加以引用。陳壽也是以個人之力編纂《三國志》的。他去世之後，梁州大中正範頴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與洛陽令到陳壽家抄寫該書，於是《三國志》方得以流傳。不過，私家著史難以像司馬遷、班固那樣寫成體例完備的鴻篇巨制，總是留有些缺憾。

其二，內容豐富，基本上覆蓋了後代史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魏晉文人勤於寫作，前代、當代的各種人物、事件，都可以記錄下來作為史料，產生了大量史學著作。由於內容十分豐富，後人設計出諸多條目予以歸類，即在正史之外，為參考於《春秋》體例的著作列出編年史條目，為參考於史書紀傳的著作列出別史、雜史、詔令奏議、載記、史鈔、故事、傳記、譜系等條目，為參考於史書諸志的著作列出職官、儀制、刑法、地理、時令、政書、簿錄、目錄等條目，為參考於史書論贊的著作列出史評條目。可以說，《四庫全書》為史部著作設置的十五個條目中，除紀事本末類之外，均能在魏晉時期中找到相應的著作。正因為如此，姚、秦二《志》為史部著作也設置了許多條目。至於二者所設條目有所不同，有的由於其圖書分類思想的差異，如姚《志》設有譜系類，秦《志》大概由於《四庫全書》不設譜牒類，而將晉代五十餘部家譜類著作歸入傳記類；有的則只是條目用字不同，如姚《志》設有簿錄類，秦《志》則設目錄類，二者沒有本質差別。史學著作的大量產生，是魏晉時期中國史學研究的特徵之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史部各類著作中，傳記類著作的數量最多。這些傳記不再以帝王將相作為主要描寫內容，其所關注的是當時社會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包括名人賢士、列女神仙等。其中，記載某一官員的個人傳記所占比重較大，如《吳質別傳》、《桓溫別傳》等，總數在二百部以上。大量傳記類著作從不同側面，共同展示了魏晉時代的社會風貌，具有其獨到的史學價值。

第三，子部著作。

子部著作，泛指那些以個人名義闡發某種學術觀點的著作。其中，既有表達作者哲學觀點、治國主張的政治類著作，也有介紹數學、天文學、醫學等某一專門知識的著作，所以，《四庫全書·子部總敘》曰：『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可以說，子書創作，標誌著當時社會學術成就的總體水平。人們習慣將佛教、道教著作附在子部之後，姚、秦二《志》也是這樣做的。二《志》對於魏晉時期子部著作著錄如下：

	儒家	道家	法家	名家	兵家	雜家	小說家	曆算	五行
姚志	三四	二一	七	五	二六	一八	三	一七	一五
秦志	四〇	一四六	五		十	一〇〇	三〇	七八	

(包括道教)

(包括天文)

	醫家	雜藝術	術數	譜錄	類書	佛教	道教
姚志	七	二〇			二〇五	二九一	
秦志	四〇	三七	六三	五	二	二二三	

魏晉時期子書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在有關社會政治方面的著作中，反映儒家觀點的著作所占比例較大，同時，綜合儒、道、名、法諸家的雜家化傾向也很明顯。《隋書·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魏晉時期，社會的首要課題是結束動亂，重建綱常。於是，文人們立足於儒家的基本學說，廣陳治國之見。其討論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如何做一位聖明有為的君主。東漢末年，君主昏弱，宦官外戚操縱朝政，導致綱紀混亂，群雄蜂起。魏晉文人充分注意到君主的個人素質對於國家政治的重要性，紛紛抒發己見。『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為腹，山林為面，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唐滂《唐子》）這樣直言不諱地教導君王的文章，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多見。（二）如何做一位德才兼備的能臣。君明臣賢，國家方能得到治理。為臣之道不正，也是當時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對此，文人們多有論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國害家者，其由非一也。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議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議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周昭《新論》）（三）針對時政抒發己見。舉凡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農業等各方面問題，都可以成為魏晉子書討論的內容。孫吳政

權後期，宮廷權貴奢侈之風很盛，陸景予以嚴厲批評：「吳朝貴戚，或犯道背理，雕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為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典語》）在具體論述中，文人們融入了道家、法家、名家等不同學派的觀點，如唐滂對於君主行為的描述，顯然有別於儒家傳統學說。由於融入了不同學派的學術觀點，加上討論的問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所以，許多子書類具《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的雜家類著作的特徵。例如，晉司隸校尉傅玄所撰《傅子》一百二十卷，涉及國家政治的許多問題，《隋書·經籍志》將其歸入雜家類，《四庫全書》將其歸入儒家類，秦《志》則將其兼收於儒、雜二家，說明這樣的著作內容博雜，難以按先秦子書的學派予以歸類。

其二，有關道家經典的注釋類著作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成就。魏晉文人在認真注釋儒家經典的同時，對道家經典著作也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在姚《志》著錄的二十一部道家類著作中，有關《老子》的著作十七部，其餘為當時人所撰論著，尚無有關《莊子》的著作，說明當時道家研究的熱點是《老子》。秦《志》著錄的道家類著作中，有關《老子》的著作三十一部，有關《莊子》的著作十八部，說明晉代學者繼續重視《老子》研究的同时，在《莊子》研究方面也傾注了許多精力。在上述《老》《莊》研究著作中，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莊子注》較有代表性。

其三，各種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實用性的科技類子部著作數量較多，成就顯著。戰爭年代，軍事學得到長足發展，三國時期產生了二十六部兵家著作。其中，曹操、諸葛亮的兵書受到歷代軍事家的重視。另外，魏晉時期還產生了四十七部醫書，九十五部天文曆算類著作，其中，魏儀同劉徽注《九章算術》，撰《海島算經》，均為中國早期數學經典；晉太醫令王叔和全面整理前代醫學著作，他所編定的張仲景《金匱要略》、《傷寒論》，他所撰著的《脈經》，仍然是目前中國醫學研究的必備書籍。

其四，佛教、道教類書籍體系漸趨完備，發展速度驚人。長期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為宗教的繁衍興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經過僧人與道士們的不懈努力，兩晉時期，佛教與道教均成為信徒眾多、教義鮮明，且為文化學術界普遍接受的宗教組織。

中國翻譯佛經始於東漢，「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隋書·經籍志》）；漢譯佛經有了更為廣泛的讀者群體。姚《志》著錄的佛教著作翻譯、撰著於魏吳兩國，其中漢譯佛經一百九十九部，大部分經文為一卷、二卷，四卷及其以上者共有十九部。另外還有六部為支謙、康僧會所撰的經贊、經注。支謙與康僧會是受到孫吳宮廷禮遇甚厚的僧人，二人皆翻譯大量佛經，

其所撰經贊、經注有助於學習佛經。三國時期，吳國最為重視佛教。晉代與三國時期稍有不同。據我們初步統計，秦《志》著錄的佛教著作中，漢譯的佛經（包括律、論）六十部，為佛教經典所作的注、序、義疏等八十七部，佛教著作目錄六部，僧人傳記二十四部，晉代僧人撰寫的論著四十六部。通過統計可以看出，漢譯佛經只占總數的四分之一稍強，而研究佛經、闡釋佛理、宣傳僧人的著作佔有絕大多數，反映出晉代佛學的學術傾向。在漢譯佛經中，包括《華嚴經》等大型佛教經典。

中國道教的淵源，可以上溯於先秦時期的神仙方士之術。東漢末年，經張陵、張魯具體組織運作，道教在民間廣為流傳。三國時期，道教的各種組織仍很活躍。姚《志》將三國時期的道教著作分作三個門類，各個門類沒有標明名目。第一類是包括《太平經》在內的經、圖、記類著作，共二百零六部，其中各種『經』一百三十二部。第二類是《自來符》等各種符書，共五十六部。第三類是《太清丹經》等各種煉丹術著作，共二十九部。葛洪《抱樸子內篇·釋滯篇》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所批評的應當包含有上述道教著作。秦《志》將道教著作與道家著作混編一處，可以大致認定為道教著作的有六十六部，其中各種『經』十八部，神仙傳記十八部，其餘為道教論述、歌訣、方術等，道教著作數明顯少於三國時期。在晉代道教著作中，較有影響的是葛洪《抱樸子內篇》。該書詳細論述了道教教義，以及有關煉功、煉丹、服食、用符等具體方術，對道教的進一步興盛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四，集部著作。

集部著作大致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著作。姚、秦二《志》對於魏晉時期集部著作著錄如下。

	楚辭	別集	總集	石刻碑文
姚志		七六	一五	
秦志	二	四四〇	七七	一〇三

在魏晉集部著作中，別集的創作成就最為引人注目。別集的編定始於東漢。《隋書·經籍志》曰：『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

名之為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別集的名稱，大概創始於東漢時期。自屈原以下，著述的文人很多。然而他們的志向不同，風格有別。後代的君子，希望通過觀賞前人的文章而瞭解其精神境界，所以將前人的作品分別收集起來，稱之為集。後代的作者景慕前人，也將自己的作品記錄下來，於是形成了集部。』魏晉別集的編定，也主要是後人追錄與作者自編兩種形式。稍有例外的是《曹植集》。《藝文類聚》載曹植《文章序》曰：『餘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知曹植曾自編別集。又《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載魏景初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知魏明帝曹睿曾詔命編定《曹植集》。南宋甯宗嘉定年間刊刻的《曹子建集》，收錄曹植作品二百一十篇。此外，還有許多零散流傳的曹植詩文。在魏晉時期諸多別集中，曹植存世的作品最多。另外，魏晉別集涉及作者之廣，涵容作品之多，亦遠勝東漢別集。

中國古代文學總集的編定早於別集。《四庫全書·集部·總集序》曰：『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秀稗鹹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也。』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是《詩經》。姚《志》以曹丕所編《建安七子集》為三國總集之首。曹丕《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李善注：『都，凡也。』曹丕如何編輯七子作品已不可知，如果他先將七子作品置於其個人名下，再彙編成集的話，則其所編《建安七子集》當視為叢書，而非總集。《隋書·經籍志》認為編輯綜合性的文學總集始於晉代摯虞，稱『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摭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摯虞所編《文章流別集》今已亡佚，從其《文章流別志》殘文推斷，其《流別集》在按照文體選編佳作方面確實具有開創之功。

以上是魏晉時期著作的大致情況。上述這些魏晉時期著作是魏晉文化的主要承載者，是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遺產。魏晉時期的學者十分注重對當時典籍的整理與收藏。《隋書·經籍志》曰：『魏氏代漢，採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

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細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集。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西元四三一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王隱《晉書》對鄭默制《中經》事記載稍詳，「鄭默，字思元，為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簿》。」（《初學記》卷十二）知鄭默曾對當時官藏書籍進行過分類整理。荀勗任秘書監事在晉泰始年間（西元二六五年至二七四年）。《晉書·荀勗傳》曰：「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知荀勗所整理的是西晉初年的中央政府藏書，其著錄書籍數量較《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書籍已有較大增長。雖然謝靈運《四部目錄》著錄書籍六萬四千餘卷之事尚需進一步論證，但是，東晉末年官府具有豐富藏書應是不爭的事實。同時，荀勗、謝靈運著錄的書籍中有多少是魏晉文人著作已不可知，從東漢末年和西晉末年兩次社會大動蕩對書籍的嚴重損毀，以及其後書籍卷數的迅速增長情況看，荀、謝二人著錄的書籍大多數應為魏晉時人的作品。

東晉末年至今已歷一千五百多年了，在此期間，經歷了多次改朝換代，發生了無數兵災禍亂，社會物質財產受到嚴重損失的同時，歷代圖書，包括魏晉書籍散佚嚴重。據我們初步統計，《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現存魏晉著作不足六百部，其中，絕大部分是明清學者的輯佚成果，相對完整的著作只有一百部左右。以《隋書·經籍志》卷三子部儒家類所著錄圖書為例，該類共著錄通計亡書六十七部，可以認定為魏晉人所著子書三十七部，其中《隋志》已著錄為亡書的達二十五部，亡佚書占三分之二強。另外當時尚存的十二部書，除李軌《揚子法言》注之外，現在均已亡佚，僅有少量殘章斷句存世。魏晉書籍散佚情況可見一斑。

從文化學術的現實需要出發，歷代文人均注重對前代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編纂。其中，總集如《昭明文選》、《樂府詩

集》、叢書如《漢魏叢書》、《四庫全書》、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等，均收錄有魏晉文人的作品。然而，這些作品散見於各處，或版本繁多文句有異，或殘文零亂難窺全貌，或文字訛誤未經校勘，學人查閱起來極不方便。有鑒於此，我們經過反復論證，決心集中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要學術力量，編纂一部總匯現存魏晉時期文獻的大型叢書——《魏晉全書》。

實踐中，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編制《魏晉全書收錄圖書目錄》，儘量收集現存魏晉時期的各類文獻。

現存魏晉文獻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甲、相對完整的著作；乙、散見於各種總集、專著、類書中的單篇詩文或語句片段；丙、不同時期出土的墓誌、碑刻、簡牘等。為了儘量將這些現存魏晉文獻彙聚起來，我們做了大量的文獻普查工作：查閱《隋書·經籍志》等歷代官修目錄、私家目錄以及各種補史藝文志著錄的魏晉圖書，大致瞭解魏晉時期的文獻概貌；查閱《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叢書廣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各主要圖書館（包括日本、韓國、美國主要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瞭解現存魏晉圖書的書名、版本及收藏該書的圖書館；歸納整理嚴可均、馬國翰、黃奭、王仁俊、逯欽立等人的輯佚成果；調查魏晉墓誌、碑刻、簡牘的整理現狀。在此基礎上，我們三易其稿，編制了基本反映魏晉文獻全貌的《魏晉全書收錄圖書目錄》。該目錄共收錄經部著作二百二十五部，史部著作二百三十三部，子部著作一百五十二部，集部著作一千一百七十部，總計一千七百八十部。

該《目錄》的編制原則是，其一，以人為序、以書系人。即將魏晉時期的詩文作者按其大致生活時間先後排序，再將其全部作品列於該作者名下。這樣編排，便於讀者瞭解該作者的全部作品，同時又能反映出魏晉二百年間文獻發展的總體趨勢。在具體操作中，有些作者生卒年無考，我們將其置於與其生活時代相近的作者名下，少數作者生活時代難以確定，則置於全書之末；有些作者生活時代跨越漢魏或晉宋，我們參照幾部補史藝文志的做法決定是否收錄；十六國文人及其作品予以全部收錄。在這裏，應當感謝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董治安先生、劉曉東先生以及該所全體同仁。起初，我們是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制目錄，並已完成第一稿。二〇〇一年，我們專程赴山東大學，學習該所編纂《兩漢全書》的經驗，

受到董先生、劉先生等人的熱情接待。他們毫無保留地詳細介紹了《兩漢全書》的體例及編纂體會，惠贈了用作編纂藍本的《兩漢全書目錄》，使我們獲益頗多。受《兩漢全書》啓發，我們調整了本書編纂體例，同時，經與山東大學諸先生協商，將曹操作為特例，收入《魏晉全書》。其二，以別集的形式編輯魏晉詩文。明清以來收集整理魏晉文人詩文，多冠以別集之名，如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所輯魏晉文人別集。參照前人慣例，我們將部分魏晉文人殘存的零散詩文亦以別集的形式加以編輯，如魏應璩只有《與桓元則書》「敢不策馳，敬尋後塵」八字，江衛只有《與荀仲茂箋》「舉國喁喁，歎慕盈塗」八字，我們分別冠以《應璩集》和《江衛集》。其三，作者闕名的作品情況比較複雜，其中，作者佚名的著作，如《太康地記》等，置於《魏晉全書》之末；以文本形式已經流傳於世的詩文作品，如《三國志·吳書·孫皓傳》引《曆陽山石文》、《晉書·蔡謨傳》引公卿奏劾蔡謨文等，分別收入《闕名作者詩歌彙編》、《闕名作者文章彙編》，置於全書之末；以拓本（或隸定拓本）形式流傳的石刻碑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先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等專書已有收錄，我們只在全書《附錄》中列舉有關書名，上一世紀出土了數批魏晉簡牘，大多數簡牘尚在簡牘擁有者手中進行考釋，其結果公佈有待時日，我們亦只在《附錄》中說明有關研究現狀。其四，佛教、道教經典已經分別收錄於《大藏經》和《道藏》，我們只在《附錄》中列舉有關經名；僧人、道士個人撰寫的詩文，則以別集的形式予以收錄。

二、運用傳統目錄學、輯佚學、校勘學、考據學等方法，對收集到的各類魏晉文獻進行初步整理。

為了便於讀者使用本書，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其一，撰寫作者小傳及著作內容提要。《魏晉全書》共涉及魏晉時期的作者一千二百餘人，我們在每位文人名下撰有小傳，簡要介紹其生平及其業績；將每位文人的各種著作以經史子集為序編排，每部著作撰有內容提要，簡要介紹其主要內容及版本情況。魏晉文人大多沒有準確的生卒年記載，少數文人事迹無考，因此，我們僅就有關史料作出客觀介紹，不詳之處甯付闕如。

其二，進一步輯補各書佚文。前代學者的輯佚工作為我們提供了大量輯佚成果及實踐經驗，我們在充分吸收借鑒的基礎上，還做了以下工作：甲、利用各種引書引得輯補佚文；乙、利用《國學寶典》等大型電腦軟體檢索佚文；丙、動手翻檢《玉海》、《玉燭寶典》、《永樂大典》、《文館詞林》等十餘種圖書，收集有關佚文。從我們的實際運作看，魏晉文獻的